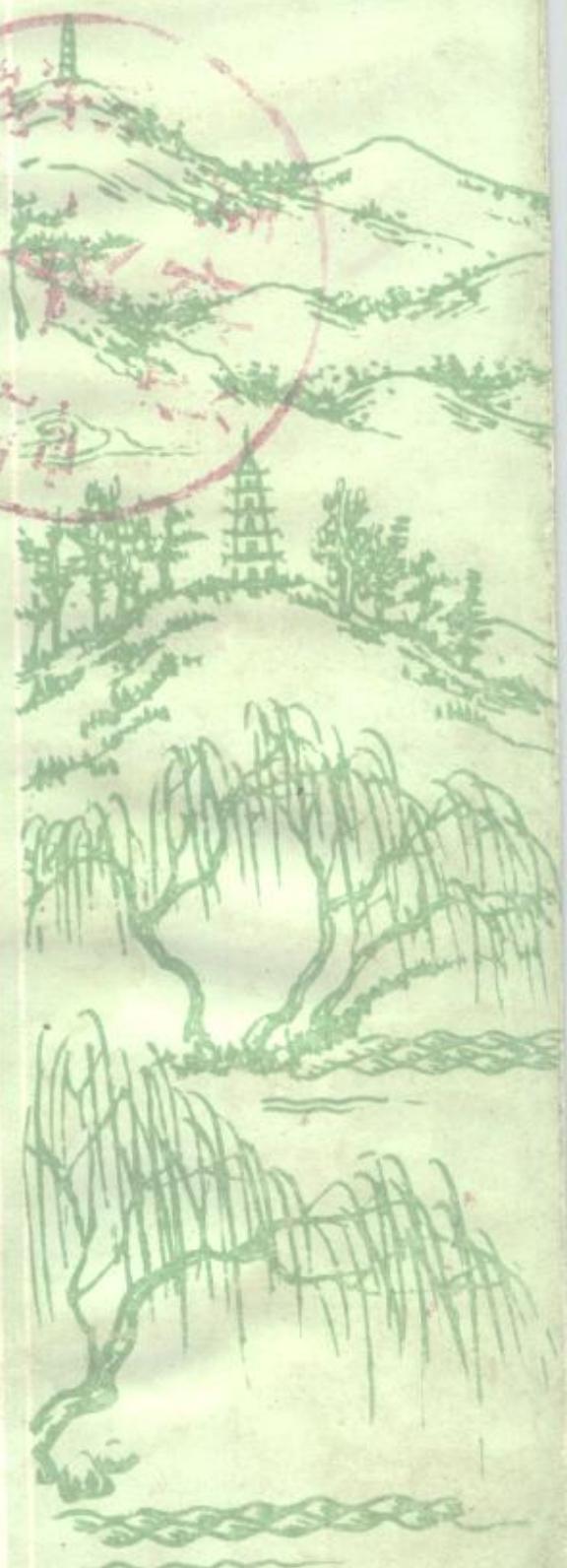


南宋京城杭州

1101



南宋京城杭州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杭州市委员会办公室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

封面设计 石宪章

**主编 周 勋
编 辑 徐 冲
刘尚时**

南宋京城杭州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办公室编
杭州西湖印刷厂印刷**

1985年2月出版

工本2.30元

(内部发行)

序

杭州都市的开发较后于中原。仅从史籍记载，作为南宋建都的临安，较之长安、洛阳、汴京，都在其后。惟北京作为统一中国的首都，才开始于辽末元初。可是杭州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由于隋开运河和“地有湖山美”，至北宋已有“东南第一州”之称。且自唐宋以来，浙江省之明州、杭州、温州、秀州先后开放市舶贸易，因而中外商贾荟萃，自然同杭州的繁华与游览之盛有很大关系。所以旧闻遗事，撰述繁富。清季丁氏《武林掌故丛编》之所收辑，以及唐宋人笔记诗文之所述及，不可胜计。但专从南宋京城杭州之各方面，由学人专家分撰专文，汇编成书，则迄今还是少见。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有鉴于杭州已成开放之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为使省市与全国人民，由前史启迪其爱国主义精神，亦为中外旅游访问者增进对古杭州都市渊源的了解，将近年来部分学者、教授对南宋杭州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南宋京城杭州》。校印将成，要我写一序文。自愧浅陋，老迈荒落，既辞谢不得，只得勉应而抒所见。

南宋一代，约一百五十年间，疆土虽缩，但经济文化实有长足的进步。

南宋临安的都市建设，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尤其是在对外贸易上，宋初一承唐制，在浙设置杭州、明州两

市舶使司，至南宋更以市舶税之利，增设温州、秀州市舶司。当时海外贸易，自日本、印度、阿拉伯国家直至非洲的北部。杭州等地精制的瓷器等手工艺品，远销外洋。更有影响于社会发展的是农业经济，南宋一代仍据有农产品的主要产区。且循已往水利灌溉的基础，占城稻良种的引进，棉花种植的推广，农业很快发展。南宋末年，钢铁业与煤炭工业亦都有显著的进步。

南宋学术文化，初不因承北宋多数儒哲而多探究理学（唯心哲学）而有损于文化各方面的正常发展。回忆我少年时从柳翼谋先生（诒征）受学中国文化史，先生示以：宋代学术，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无所不备。既列举当时史学、经学、文字、目录学各有名著，以证当时学风的昌盛。其于《宋史》特立道学传的理学家言，疏示其源流，以为纵有末流之弊，其总的鹄的都在讲明立身为人之道，决非虚妄不学之谈，心韪其言。而循寻宋代学术，见一般通史仍多以理学流派谈宋世学术。近人张舜徽教授更详论两宋师儒各有特长，很多为清代学术开其先河。他广征博引，对于包括文字、目录学之整理；古典文献，包括通史、旧史以及当代史料的整理；进而寻绎宋人对于天文、算术、地矿、动植物乃至工程、工艺美术各方面的贡献，引证翔实，从而得出结论说：“宋代学者的治学，具有博大的气度，且多为后代学者开辟新的途径。”（见张著《中国史论集》第二集78—128页）识者以其引证确凿，称为至言。这些自然是统两宋两言，但假使不是南宋学者之继承，沿袭且所创新，还不易得出这样著重的肯定。

南宋在我国历史文化上既多重要的贡献，在经济上如工

商业，尤其对外贸易亦有长足的发展。作为这一代首都的杭州，自然作出过多量的贡献，享受过中外的称誉。今试略加回顾。原来钱塘本一小县，至隋才升为郡治，始有杭州这个地名。隋炀帝开江南运河，绕太湖直至杭州入钱塘江，使杭州和当时首都洛阳有直达的水道，从而促进其繁荣。经过唐代对西湖与城市的治理，接着是五代吴越钱氏定都建国八十余年的和平，继以如苏东坡那样的贤地方官的治理，对杭州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便利。关于西湖的整理，上溯唐代刺史白居易，经过宋代的苏东坡等，直至明代的杨孟瑛，及至近代都作过很多工作。本书有《西湖的沧桑》叙说，无须多赘。这里只要将钱氏降宋，与南唐败亡时作个比较，宋末元初马哥波罗等所见的杭州与当时号称六朝古都的南京相比，就可明白那时杭州的繁荣是远过之了。

酌古准今，彰往策来。杭州既为江南一历史名城，在今日形势下，将日增其重要性。今建设杭州的方略已定，它必将成为更为繁荣、美好的历史文化风景名城。

陈训慈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序	陈训慈	(1)
南宋定都临安的经过和原因	林正秋	(1)
南宋故宫遗址考察	王士伦	(16)
南宋德寿宫	陈觉民	(36)
南宋宫城禁苑中的隋唐五代遗迹	张福全	(40)
南宋的中央官署	林正秋	(46)
南宋临安府府署和知府	林正秋	(50)
南宋临安人口	林正秋	(61)
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	倪士毅 方如金	(72)
南宋临安的丝绸业	吴志刚 赵 丰	(90)
南宋临安的工艺	傅伯星	(101)
南宋临安城门沿革	陆鉴三	(105)
南宋临安的坊巷	崔富章	(119)
南宋临安的学校	王士伦	(140)
南宋的皇家画院	王伯敏 洪再新	(148)
南宋西湖诗词	王荣初	(160)
南宋临安以来的话本小说	刘操南	(178)
南宋杂剧的形成及其流变	沈祖安	(189)
南宋临安的瓦舍和歌舞、百戏	莫 高	(203)
南宋临安浙派的古琴艺术	徐晓英	(210)

- 南宋临安的印刷业 莫 高 (215)
西湖的沧桑 乌鹏廷 (220)
南宋临安园林 姚毓璆 郑琪生 (229)
西湖十景 傅伯星 (243)
南宋时期杭州的旅游 乌鹏廷 (248)
南宋时钱江观潮 宋宪章 (256)
南宋临安的佛教以及佛教寺院 俞昶熙 李祖荣 (259)
南宋临安的道观和祠庙 傅伯星 (274)
南宋临安的饮食业 乌 克 (284)
南宋杭州的民俗 王企敖 (289)
南宋王朝的覆亡 王士伦 (297)

附 录：

- 南宋帝王表 倪连德 (303)
南宋宰相表 倪士毅 (305)
南宋临安府知府表 林正秋 (317)
南宋杭州名人录 倪连德 ([331])
南宋临安大事记要 林正秋 (350)
“南宋杭州”书刊要目 黄建国 张克夫 (383)
南宋临安府图
皇城图
京城图
西湖图
后记

南宋定都杭州的经过和原因

林正秋

一、“靖康之难”与北宋覆灭

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北宋皇朝日趋腐败。哲宗病歿，徽宗赵佶（1082—1135年）继位，国势更是江河日下。徽宗是一个荒淫昏庸的皇帝，在位二十五年（1100—1125年），穷奢极欲，不理国事。佞臣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与朱勔专权用事，结党营私，货贿公行，荼毒生民，时人称之为“六贼”。

他们先意承旨，于崇宁元年（1102年）在苏州与杭州设立“造作局”，由童贯主持。集中东南工匠数千人，“造作器用，诸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等各种工艺品，供徽宗享用。致使东南富庶之地，也随之陷入“民力重困”地步。过了三年，又在苏州设立“应奉局”由朱勔主持。专门搜集东南诸地奇花异木，珍异物品运往汴京。航运时以十船为纲，故名“花石纲”。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无不指名强取。搬运时，曾有拆屋毁墙以出。吏员借机讹诈，无数人家为此倾家荡产。

徽宗即位不久，因奢侈浪费，国家财政空虚，连续若干年，年岁入只能供八、九个月的支用。为弥补财政亏缺，多次铸造当五当十的大钱，把茶税提高了好几倍，把政府所需绢帛改为无偿的榨取，公开标价出卖官爵……。“西城括田所”的设立，名义上，是把一些无主荒地或业主死绝逃亡的土地“括入”（即没收），作为公田，实际上是强占私人肥沃土地，把原业主迫使佃户。绵亘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没收为“公有”。凡进入梁山泊捕鱼或采莲藕蒲苇的，都令其依“对分”方式向政府交纳租课。甚至把黄河口湮没过的土地，亦作为无主土地没收。如业主抗拒上诉，“辄加威刑，致死者千万”。十年之间，经杨戬掠夺的民田达三万四千三百多顷。蔡京、童贯等“六贼”，依仗权势，掠夺大量田园房舍财产，富可敌国。《玉照新志》卷三载，朱勔的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半吴郡（今苏州）”。

正当北宋王朝处在“人心携贰，天下解体”之时，在我国东北黑龙江、松花江与长白山一带的女真族崛起。公元十世纪中叶后，女真族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逐渐摆脱渔猎和游牧生活，开始定居，耕地种粮，并学会了剥木为器，制造舟车、烧煤与炼铁等技术。此时，女真族是在辽的统治之下。到了十一世纪末，其中的完颜部成为女真诸部的核心。（参见《金史》卷一《世纪》。）

政和三年（1113年），杰出的首领阿骨打继任女真部落联盟的酋长，举旗反辽，把松花江和辽河之间的大片土地收归了女真族的势力范围。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于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县南）建立了女真政权，国号大金。阿骨打就

是金太祖。

正当女真族反辽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以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认为辽朝必败，企图借助金兵收复燕云诸州，以缓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从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起，先后数次派人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泛海到金，相约交攻辽朝。过了三年（1120年）又派赵良嗣（即马植）等赴金具体协商夹攻辽国方案，最后约定双方出兵各以长城为界，金攻辽的中京（今内蒙古城县西），宋攻燕京。灭辽以后，燕云诸州归宋；北宋原来每年给辽的银和绢照数转献给金朝。结果金兵如约打败了辽军，俘虏辽皇帝天祚。而宋军在1122年两次进攻燕京，“一攻之，而童贯败于白沟，再攻之，而郭药师败于燕山，夹攻而弗能攻也”。

年底，金军由居庸关进军攻下燕京。几经交涉，宋给金岁币三十万匹绢、二十万两银及燕京代税钱一百万贯钱，从金军手中换回了燕京及其附近的蓟、景、涿、顺、檀、易等六州。金兵退兵时，把燕京的官吏、富民、金帛、女子掳掠而去。宋军从金人手里接收了六座空城。

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军开始大规模南侵。从此时起，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金朝从反抗辽朝奴役、争取独立的正义战争，转化为女真贵族对北宋的掠夺战争。侵宋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打算在北宋汴京会合，消灭北宋。西路军在太原遭到北宋河东军民的抗击，无法前进。东路军因燕京守将郭药师投降，得以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次年迅速渡过黄河包围了汴京。面对强敌，北宋君臣却乱作一团。

宋徽宗急急忙忙把帝位传给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诏

改明年轻年号为靖康。徽宗、童贯、蔡京一伙，由蔡京领兵二万护送逃出东京，到镇江避难。

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北宋朝廷也分为两派。留在开封以张邦昌为首的投降派，伙同蔡京党羽，主张屈膝投降；以李纲为首的抗战派，得到爱国军民的支持，力主抗战。钦宗当时迫于抗金，军民群情激愤，不得不在靖康元年正月下诏亲征，并起用李纲主持汴京防务。由于李纲的积极布防，激励军民奋勇杀敌，各地义军也纷纷抵达开封。一时间，士气旺盛，多次打退金兵的进攻。金军攻城不下，也担心孤军深入，归路被截，正想撤退时，而与乃父一样昏聩软弱的钦宗却向金乞和。金军乘机勒索了黄金五百两、白银五千两、牛马万匹、衣缎一百万匹和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后，匆匆北撤。金兵一退，徽宗一伙又悄悄返回汴京，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

女真南侵军队撤退后，河北人民开展了保卫乡土的顽强斗争，使金军不能凭靠北宋政府的诺言而劫取三镇二十州的土地。时隔半年，金军以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兵分东、西两路南下，给北京施加军事压力。又于靖康二年（1127）正月攻入汴京。把徽宗、钦宗先后扣押在金营之中，并废黜为庶人。三月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建立大楚伪政权。四月初一日，金军押着徽、钦二帝和后妃、太子，以及宗室文武大臣三千余人撤出汴京，大肆洗劫宫廷。沿途“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兗、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这就是北宋王朝覆灭的“靖康之难”。

二、宋室南迁

金人在北撤时，曾按赵姓皇室的谱牒，把皇室中的男女老少俘虏而去。但是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正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名义，在河北而漏网。金兵北撤后，抗金名将宗泽上书给赵构说，“今二圣、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济（山东巨野）……宜亟行天讨（张邦昌），兴复社稷”。“今天下百姓所注耳目，系其望者，惟大元帅康王一人”。希望他振作精神，不辜负北宋军民抗金的愿望。在宗泽等北宋旧臣的拥戴下，赵构于靖康二年五月初一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赵构就成了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即宋高宗。

南宋政权建立初年，由于金兵步步进逼，应天府不能久呆，于是定都成为南宋统治者稳定新政权与抵挡金军南侵所必须立即考虑并迅速抉择的首要问题。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文武群臣，齐献方案。在最初的四年中，“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而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南宋成了流亡政权。在此期中，廷议迁都事，争论激烈的就有三次。

第一次在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高宗根据黄潜善、汪伯彦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为避乱之计，来春还阙”。李纲极论其不可，他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岂惟今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治兵胜敌以

归二圣哉？”“为今之计，纵未行上策，当暂幸襄、邓，以系天下之心。夫襄、邓之地，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进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连江、淮，可以运谷粟。山川险固，民物淳厚，愿为今驻跸之地。俟两河就绪，即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经过李纲这一番分析，高宗暂时收回了手诏，下令让文武廷臣进一步商议决定。据《吕中大事记》载，当时提出三种方案：李纲请营南阳，宗泽请幸京城，汪、黄请幸东南。争论的焦点是坚守中原还是巡幸（迁都）东南。李纲在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军事形势后说：“今日之事，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提出了并建三都的设想，他说：“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这是从当时南宋政权刚刚建立，军事上金强宋弱的特定形势着眼的。他认为，“并建三都”的好处有三：“一则藉巡幸之名，使国势不失于太弱；二则不置定都，敌人无所窥伺；三则四方望幸，奸雄无所觊觎。”所以他以为“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此时金人兵临城下，次月，高宗匆匆下诏：“巡幸东南为避敌之计。”许多大臣上书表示支持。

经过君臣的议论商讨，认为迁都建康是可行的。第一，建康是六朝故都，东南要地；第二，东南久安，财力富盛，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第三，凭险长江，有利于军事上的固守。

迁都建康从商议变成了定论。赵构在商丘仅呆了五个月，便弃城“巡幸”建康了。

年轻的岳飞上了洋洋数千言的《南京上皇帝书》，其中说：

“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迎还二圣，奉车驾日益南，又令长安、维扬、襄阳准备巡幸。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恐不足系中原之望。

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罢三州巡幸之诏。乘二圣蒙尘未久，敌穴未固之际，亲率六军，迤逦北渡，则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

奏章没有说服高宗，却忤了权幸黄潜善、汪伯彦，以“小臣越职，非所宣言”，被“夺官归田里”。

同年十月，高宗一行逃难到了扬州。他原想喘一口气，迁都之事，就依了大将张俊“今敌势方张，宜且南渡，据江为险，练兵政，安人心，俟国势定，大举未晚”的意见，在扬州呆下来了。他们迷恋扬州的生活，开始修建宫室，

“禁中修造复兴，御前生活复作，宫中费用复广”。投降派越来越嚣张，他们竭力攻击李纲，胡说什么“靖康之初，纲……倡为守城之计，卒之二圣北迁，至今未复者，纲之所致也……”他们不作抗金措施，只有“偷安岁月”的打算。内侍邵成章弹劾汪、黄误国，高宗竟以“不守本职，辄言大臣”的罪名而远窜。谁知好景不常，刚过了一年多，金兵又跟踪而至，其速度之快是高宗预想不到的。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金军破天长军，距扬州仅数十里。高宗闻讯，仓卒渡江。

逃到镇江后，他又预感到镇江、建康等地濒临大江，离前线太近，仍不安全。即于次晨召集文武近臣再度商议下一步的“巡幸”计划。这是第二次讨论迁都。此时，高宗对金、宋军事实力的对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害怕长江天堑，未必挡得住金兵马蹄，所以他说：“姑留此，或径趋浙中

邪？”吏部尚书吕颐浩乞留跸，以为江北声援。群臣附议。独有王渊提出“请幸杭州”。他说：“镇江止捍得一处，若金自通州渡江，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阻。”此论虽未获几多支持，却正合赵构心意，于是当即决定：今夜径趋杭州。廷议中，朱胜非因故外出片刻，待返回时，高宗告诉他：“适议定，不若径去杭州。”并指令朱胜非留守，处理后事。有人把迁都杭州这件事归咎于秦桧，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是缺乏根据的。

高宗一行途经平江府，赵构召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卫肤敏入对。卫也说：“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但他一看高宗的态度，马上转圜说：“为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表示尊重赵构的“圣裁”。卫肤敏这种貌似折中，实为附议的论调，安抚了群臣，支持了高宗，深得上心。迁都杭州就此事实上定了下来。

二月壬戌（十三日），南宋君臣到了杭州。“诏令”改州治为行宫，以显宁寺为尚书省，下诏罪己，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还窜逐诸臣，就是不赦李纲。赵构打算偏安于钱塘了。不料三月初发生了扈从统制苗傅及刘正彦的兵变，“迫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赵）旼，请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给了高宗当头一棒。几经周折，拖了近一个月，赵构才勉强复位。这个意外打击，使高宗觉得有必要重视一下舆论，做出一些抗战复国的姿态来，以保自己刚从地上捡回的皇冠；于是“颁诏”，立即移跸建康，表示志在抗金。然而，战局的进展十分不利于宋，宋军继续溃退，建康眼看不保。

就在这四面楚歌的危急形势下，在建炎三年闰八月丁丑朔，高宗召集随驾百官与诸统制第三次商议“巡幸”之事。这次商议与以往两次不同的有二：首先是战局进一步严重，使群臣比较冷静地考虑主客观的可能性，与宋金双方的军事实力；其次，赵构接受“兵变”教训，虽可“御裁”也多让大家分析利弊。讨论一开始，高宗先提出三种方案，要大臣们抉择。他说：“朕若定居建康，不复移跸；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孰害？”当时会上气氛热烈，群臣所提方案也多，就中较有影响的是张浚和马扩的意见。张浚提出迁都武昌，吕颐浩附议，但招来江浙籍官僚的激烈反对。马扩则提出“上策幸巴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驻跸建康”的“三策”论，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总括反对者的意见是：“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御史中丞张守和谏议大夫滕康是最激烈的反对者。张守指责说：“东南今日根本也。陛下远适，则奸雄生窥伺之心。况将士多陝西人，以蜀近关陕，可图西归，自为计耳，非为陛下与国家计也。”迫于“建都金陵”的呼声有相当影响，高宗只好决定暂留建康。

但是，形势越来越严重，建康危若累卵。赵构心神不宁自不待言，就是百官群僚也希望权都杭州。尚书考功员外郎楼炤就曾对高宗说：“今日之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国力。”此言正中高宗下怀，下了决心。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准备移跸迁都。可是，金兵铁蹄已践踏江南，